新时代外国语言文学
新发展研究丛书

总主编　罗选民　庄智象

语义学新发展研究

文　旭　唐瑞梁／著

清華大學出版社

新时代外国语言文学
新发展研究丛书

总主编　罗选民　庄智象

语义学新发展研究

文　旭　唐瑞梁／著

清華大學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语义学是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语言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研究语言就是研究意义。古今中外，不同的学科都对意义问题给予了关注，但是只有语言学内的语义学研究将语义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并展开了全面系统的探究。进入21世纪后，随着语言学研究的地位在人文学科中的日益提升，语言意义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不同学科的关注。本书基于近十年来我国语义学的研究成果，围绕词汇语义学、句义学、话语语义学、形式语义学、认知语义学、语义演变研究和语义学的应用研究等内容，回顾、总结、梳理并提炼语义学研究在我国的创新与发展，为从事语言学，尤其是语义学研究的学者和研究生提供参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010-62782989，beiqinquan@tup.tsinghua.edu.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义学新发展研究 / 文旭，唐瑞梁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10
（新时代外国语言文学新发展研究丛书）
ISBN 978-7-302-57274-9

Ⅰ. ①语… Ⅱ. ①文… ②唐… Ⅲ. ①语义学—研究 Ⅳ. ① H0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004998 号

策划编辑：郝建华
责任编辑：郝建华　倪雅莉
封面设计：黄华斌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朱雨萌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者：三河市启晨纸制品加工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mm×230mm　　印　张：15.75　　字　数：237 千字
版　　次：202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2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08.00 元

产品编号：088056-01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新时代外国语言文学新发展研究丛书”
编委会名单

总主编

罗选民　庄智象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蔡基刚　陈　桦　陈　琳　邓联健　董洪川

董燕萍　顾曰国　韩子满　何　伟　胡开宝

黄国文　黄忠廉　李清平　李正栓　梁茂成

林克难　刘建达　刘正光　卢卫中　穆　雷

牛保义　彭宣维　冉永平　尚　新　沈　园

束定芳　司显柱　孙有中　屠国元　王东风

王俊菊　王克非　王　蔷　王文斌　王　寅

文秋芳　文卫平　文　旭　辛　斌　严辰松

杨连瑞　杨文地　杨晓荣　俞理明　袁传有

查明建　张春柏　张　旭　张跃军　周领顺

总　序

外国语言文学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 1862 年同文馆始建，我国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已历经一百五十余年。一百多年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一直伴随着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发展壮大，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外交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增强了与国际社会的交流、沟通与合作，每个发展阶段无不体现出时代的要求和特征。

20 世纪之前，中国语言研究的关注点主要在语文学和训诂学层面，由于“字”研究是核心，缺乏区分词类的语法标准，语法分析经常是拿孤立词的意义作为基本标准。1898 年诞生了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尽管“字”研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该书宣告了语法作为独立学科的存在，预示着语言学这块待开垦的土地即将迎来生机盎然的新纪元。1919 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掀起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浪潮，语言文学研究（包括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得到蓬勃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势头持续迅猛。至 20 世纪末，学术体系日臻完善，研究理念、方法、手段等日趋科学、先进，几乎达到与国际研究领先水平同频共振的程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并支持和服务于改革开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无独有偶，在处于转型时期的“五四运动”前后，翻译成为显学，成为了解外国文化、思想、教育、科技、政治和社会的重要途径和窗口，成为改造旧中国的利器。在那个时期，翻译家由边缘走向中国的学术中心，一批著名思想家、翻译家，通过对外国语言文学的文献和作品的译介塑造了中国现代性，其学术贡献彪炳史册，为中国学术培育做出了重大贡献。许多西方学术理论、学科都是经过翻译才得以为中国高校所熟悉和接受，如王国维翻译教育学和农学的基础读本、吴宓翻译哈佛大学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美学作品等。这些翻译文本从一个侧面促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美学、教育学等，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得以创建和发展的。翻译服务对于文化交

流交融和促进文明互鉴，功不可没，而翻译学也在经历了语文学、语言学、文化学等转向之后，日趋成熟，如今在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等方面承担着重要使命与责任，任重而道远。

20 世纪初，外国文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犹如鲁迅所言，要学普罗米修斯，为中国的旧文学窃来“天国之火”，发出中国文学革命的呐喊，在直面人生、救治心灵、改造社会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大量的外国先进文化也因此传入中国，为塑造中国现代性发挥了重大作用。从清末开始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外国文学的引进和译介蔚然成风。经过几代翻译家和学者的持续努力，在翻译、评论、研究、教学等诸多方面成果累累。改革开放之后，外国文学研究更是进入繁荣时代，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逐渐深化，在外国文学史的研究和著述方面越来越成熟，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译介和研究方面、在不断创新国外文学思想潮流中，基本上与欧美学术界同步进展。

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的重大意义，在于展示了世界各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在文学主题深化、表现形式多样化、题材类型丰富化、批评方法论的借鉴等方面显示出生机与活力，显著地启发了中国文学界不断形成新的文学观，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丰富的艺术资源，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高校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开展。

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外国语言学研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仅及时引进了西方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还将这些理论运用到汉语研究的实践；不仅有介绍、评价，也有批评，更有审辨性的借鉴和吸收。英语、汉语比较研究得到空前重视，成绩卓著，“两张皮”现象得到很大改善。此外，在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等与当代科学技术联系紧密的学科领域，外国语言学学者充当了排头兵，与世界分享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发现。一些外语教学的先进理念和语言政策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制定外语教育政策和发展战略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为贯彻这一要求，教育部近期提出要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等建设。新文科概念正式得到国家教育部门的认可，并被赋予新的内涵和

定位，即以全球新技术革命、新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背景，突破传统的文科思维模式与文科建构体系，创建与新时代、新思想、新科技、新文化相呼应的新文科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新文科具备传统文科和跨学科的特点，注重科学技术、战略创新和融合发展，立足中国，面向世界。

新文科建设理念对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新格局。具体而言，新文科旗帜下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目标是：服务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知识体系框架，兼备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挑战能力，彰显人文学科与交叉学科的深度交融特点，夯实中外政治、文化、社会、历史等通识课程的建设，打通跨专业、跨领域的学习机制，确立多维立体互动教学模式。这些新文科要素将助推新文科精神、内涵、理念得以彻底贯彻落实到教育实践中，为国家培养出更多具有融合创新的专业能力，具有国际化视野，理解和通晓对象国人文、历史、地理、语言的人文社科领域外语人才。

进入新时代，我国外国语言文学的教育、教学和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是理论的探索和创新，方法的探讨和应用，还是具体的实验和实践，都成绩斐然。回顾、总结、梳理和提炼一个年代的学术发展，尤其是从理论、方法和实践等几个层面展开研究，更有其学科和学术价值及现实和深远意义。

鉴于上述理念和思考，我们策划、组织、编写了这套“新时代外国语言文学新发展研究丛书”，旨在分析和归纳近十年来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重大理论的构建、研究领域的探索、核心议题的研讨、研究方法的探讨，以及各领域成果在我国的应用与实践，发现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不足，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提出可资借鉴的建议。我们希望本丛书的出版，能够帮助该领域的研究者、学习者和爱好者了解和掌握学科前沿的最新发展成果，熟悉并了解现状，知晓存在的问题，探索发展趋势和路径，从而助力中国学者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用学术成果来阐述中国故事，最终产生能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中国学派！

本丛书由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联合上海时代教育出版研究中心组织研发，由研究会下属 29 个二级分支机构协同创新、共同打造而成。罗选民和庄智象审阅了全部书稿提纲；研究会秘书处聘请了二十余位专家对书稿提纲逐一复审和批改；黄国文终审并批改了大部分书稿提纲。

本丛书的作者大都是知名学者或中青年骨干，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有很好的学术造诣，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有丰硕的科研成果，他们所承担的著作也分别都是迄今该领域动员资源最多的科研项目之一。本丛书主要包括“外国语言学”“外国文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和“国别和区域研究”五个领域，集中反映和展示各自领域的最新理论、方法和实践的研究成果，每部著作内容涵盖理论界定、研究范畴、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同时也提出存在的问题，指明发展的前景。总之，本丛书基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五个主要方向，借助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有机契合、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的相辅相成、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有效融合，科学系统地概括、总结、梳理、提炼近十年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历程、研究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为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高质量建设与发展呈现可视性极强的研究成果，以期在提升国家软实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和上海时代教育出版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我们希望在研究会与出版社及研究中心的共同努力下，打造一套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学术精品，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献上一份诚挚的厚礼！

罗选民 庄智象

2021 年 6 月

前　言

语义学是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语言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研究语言就是研究意义。人类对语言意义的思考由来已久。从古代开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对语言意义的本质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例如，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就曾著述探讨语言的意义问题，试图对名称本质的理解以及事物与其名称间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解释，并出现了“本质”与“约定”之争。语义研究在我国古代也有着漫长的历史和突出的地位，如公元前 2 世纪就有了专门解释词义的专著《尔雅》。先秦时期，哲学家荀子、墨子等对于“名”“实”关系的讨论，就详细论证了名称与实际事物间的关系。到了东汉时期，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源流的工具书，也是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字典之一。此外，中国古代涉及语义的学科主要是训诂学和名辩学。

语义学发展至今已经成为语言研究的核心领域和前沿学科，与语音学和句法学一并成为现代语言学的三大学科。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语言学研究地位的不断提高，语言意义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其他学科的关注。现代语义学研究已经成为逻辑学、语言学、哲学、符号学等多门学科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其研究也进入了多维度、多元化发展阶段。语义学研究的多维度体现在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增多。例如，在认知语言学中，语义问题的探讨往往结合了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神经科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此外，基于语料库和语言统计方法的广泛运用，带来了语义研究的实证转向，如构式搭配分析、分布语义分析、基于统计分析模型的多因素分析等。语义学研究与现代统计方法的结合实现了对前人内省式发现的检验，同时也为进一步挖掘语义现象背后的深层次规律创造了可能。今后语义学研究亟需引入更多的研究方法和其他学科的理论视角，使其在理论层面和方法论层面不断发展。此外，随着语言教学、机器翻译、人机对话、语言信息处理、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语义问题将得到更多关注。语义学研究的多元化体现在研究领域

的不断扩大以及亚领域的快速发展，从传统的词义学、句义学、篇章语义学，进而到言语行为、含义理论等，研究更加精细，甚至可以说，现代语义学已经涵盖了传统语用学的研究领域。

我国进入新时代以来，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外国语言文学的教育、教学和研究也不例外。近十年国内语义学研究无论是理论的探索和创新、方法的探讨和应用，还是具体的实验和实践都取得了很多优秀成果。回顾、总结、梳理、研究和提炼语义学研究在国内的发展，既具有学科和学术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本书基于近十年来我国语义学的研究成果，围绕词义学、句义学、话语语义学、形式语义学、认知语义学、语义演变、语义学的应用等研究内容，梳理语义学在我国的创新与发展，同时提出语义学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研究和展示近十年语义学研究在国内的新发展可帮助该领域的研究者了解和掌握学科和学术的最新发展成果，熟悉并了解现状，知晓存在的问题，探究未来语义学的发展趋势和路径。同时，本书的撰写也能为语言学研究生以及语言学爱好者学习和研究提供参考。此外，2021 年将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本书的出版亦是一项有价值和意义的献礼成果。

本书是集体努力的结果。第 1 章“绪论”由文旭撰写，第 2 章“词汇语义学研究”由吴淑琼撰写，第 3 章“句义学研究”由司联合撰写，第 4 章“话语语义学研究”由曹笃鑫撰写，第 5 章“形式语义学研究”由马军军撰写，第 6 章“认知语义学研究”由成军、陈熙怡撰写，第 7 章“语义演变研究”由唐瑞梁撰写，第 8 章“语义学的应用研究”由王惠静撰写。由于编写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书中如有疏漏，恳请读者见谅并指正。

文 旭

2020 年 12 月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 1

1.1　引言 …… 1

1.2　各章节内容简介 …… 4

第 2 章　词汇语义学研究 …… 9

2.1　引言 …… 9

2.2　词汇语义学、词汇学和语义学的关系 …… 9

2.3　近十年来词汇语义学研究概览 …… 10

2.3.1　词汇语义学研究的总体趋势 …… 10

2.3.2　词汇语义学研究的核心理论：认知语义学 …… 12

2.3.3　词汇语义学研究的主要议题 …… 14

2.3.4　词汇语义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 22

2.4　词汇语义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 26

2.4.1　词汇语义研究的跨学科转向 …… 26

2.4.2　词汇语义研究的社会转向 …… 27

2.4.3　词汇语义研究的实证量化转向 …… 29

2.5　结语 …… 30

第 3 章　句义学研究 …… 33

3.1　引言 …… 33

3.2　句义学国内外研究现状 …… 34

3.3 近十年来句义学研究概览 …… 35
3.3.1 句义学的核心理论 …… 35
3.3.2 研究议题 …… 38
3.3.3 研究方法 …… 60
3.3.4 研究不足 …… 68
3.4 句义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 69
3.4.1 句义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 …… 69
3.4.2 句义学的实证量化研究 …… 78
3.4.3 句义学的应用研究 …… 79
3.4.4 句义学的汉外对比研究 …… 81
3.5 结语 …… 81
第 4 章 话语语义学研究 …… 83
4.1 引言 …… 83
4.2 所言的界定 …… 85
4.3 一般会话含义的处理 …… 87
4.4 语用过程的解释 …… 88
4.5 理论争鸣的启示与展望 …… 90
4.5.1 理论争鸣的启示 …… 90
4.5.2 话语意义研究的展望 …… 92
4.6 结语 …… 94
第 5 章 形式语义学研究 …… 97
5.1 引言 …… 97
5.2 形式语义学理论与方法探究 …… 100
5.2.1 语境依赖性 …… 100

5.2.2 语义实验法与语义诊断法 …… 101
5.3 汉语典型话题研究 …… 102
5.3.1 量化词研究 …… 103
5.3.2 复句研究 …… 109
5.4 形式语义学研究展望 …… 115
5.5 结语 …… 117
第6章 认知语义学研究 …… 119
6.1 引言 …… 119
6.2 认知语义学基本理论主张 …… 120
6.2.1 认知语义学的指导原则 …… 120
6.2.2 “基于使用”的语言观 …… 124
6.2.3 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 …… 125
6.2.4 原型理论和典型效应 …… 128
6.3 近十年国内认知语义学研究状况 …… 129
6.3.1 传统研究话题 …… 129
6.3.2 其他研究话题 …… 135
6.3.3 汉语认知语义学研究 …… 137
6.4 认知语义研究发展趋势 …… 140
6.4.1 数据驱动的认知语义学研究 …… 140
6.4.2 基于语言类型的认知语义学研究 …… 141
6.5 结语 …… 143
第7章 语义演变研究 …… 145
7.1 引言 …… 145
7.2 语义演变研究学科地位的改变 …… 146

7.3 近十年国内语义演变研究概述 …… 148
7.3.1 发文数量及研究语种 …… 148
7.3.2 实词语义演变研究 …… 150
7.3.3 构式语法视域下的语义演变研究 …… 155
7.3.4 语义演变规律与路径研究 …… 157
7.3.5 语义演变动因和机制研究 …… 160
7.3.6 语义演变研究方法 …… 162
7.3.7 小结 …… 164
7.4 语义演变研究发展趋势 …… 165
7.4.1 更新语义演变研究方法 …… 165
7.4.2 拓宽语义演变研究视角 …… 167
7.4.3 加强汉外语义演变对比研究 …… 168
7.5 结语 …… 169
第 8 章 语义学的应用研究 …… 171
8.1 引言 …… 171
8.2 语义学与翻译研究 …… 172
8.2.1 框架语义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 172
8.2.2 概念隐喻、转喻理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 173
8.2.3 其他语义学理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 175
8.3 语义学与外语教学研究 …… 176
8.3.1 认知语义学视角下的翻译教学研究 …… 176
8.3.2 认知语义学视角下的词汇教学研究 …… 177
8.4 语义学与词典编纂、词典学研究 …… 180
8.4.1 认知语义学视角下的词典编纂 …… 180
8.4.2 认知语义学视角下的词典学研究 …… 184

8.5 未来研究趋势展望 …… 185
8.5.1 基于语义学的翻译研究未来趋势 …… 185
8.5.2 基于语义学的外语教学研究未来趋势 …… 187
8.5.3 基于语义学的词典编纂研究未来趋势 …… 188
8.6 结语 …… 189
参考文献 …… 191
术语表 …… 227

第 5 章
形式语义学研究

5.1 引言

形式语义学，又称蒙塔古语法（Montague Grammar）、模型论语义学（model-theoretic semantics）、真值条件语义学（truth-conditional semantics）、逻辑语义学（logical semantics）、逻辑语法（logical grammar）、可能世界语义学（possible world semantics）等（方立，2000；蒋严、潘海华，1998；邹崇理，1995；Partee，2011）。形式语义学采用数理逻辑方法研究自然语言的语义，包括句法 – 语义界面和语义 – 语用界面，旨在实现机器对自然语言的自动理解（李可胜、邹崇理，2013）。形式语义学发端于 Richard Montague 20 世纪 70 年代初发表的三篇学术论文：《作为形式语言的英语》（“English As a Formal Language”）、《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和《日常英语量化研究》（“The Proper Treatment of Quantification in Ordinary English”）（Montague，1974）。这三篇文章确立了形式语义学的基本框架、研究方法和主要议题，开创了自然语言语义研究的新思路（Partee，1975，2011）。20 世纪 80 年代初，随着蒙塔古语法的深入研究，学者们如 Kamp（1981）发现单纯依靠独立于语境的数理方法无法描写不定名词短语、量化辖域、照应语等现象。不把语境纳入研究，几乎不可能分析自然语言的意义（Kamp & Partee，2004）。1981 年，Kamp 提出了话语表征理论（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Theory）。这标志着形式语义学研究从静态逐步走向动态，其他动态语义学理论也相继问世。例如，

Heim（1982）的“文档更新语义学”（file change semantics），Barwise & Perry（1983）的“情境语义学”（situation semantics），Groenendijk & Stokhlf（1990，1991）的“动态蒙塔古语法”（dynamic Montague grammar）、“动态逻辑谓词”（dynamic predicate logic），Asher（1993）、Asher & Lascarides（2003）的“分段式话语表征理论”（Segmented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Theory）等（高芸，2013；彭家法，2007；夏年喜，2006，2010）。

然而，无论是静态形式语义学还是动态形式语义学，都遵循蒙塔古提出的基本研究假设（Abbott，1999；Partee，2011）。这些假设主要包括：（1）语言分析高度依赖抽象的数理逻辑手段。这是由于形式语义学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形式语言（formal language）研究的批判。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自然语言不完美、不系统，充满歧义、模糊和无关的句法成分。因此，自然语言不能进行形式化分析。蒙塔古创造性地提出，自然语言也是一种形式语言，是一种可解释的形式系统（interpreted formal system）（Bach，1989），自然语言和形式语言本质相同，理论上讲没有差别（Montague，1974）。两种语言都具有“普遍语法”，这是一种逻辑上可能的语法，一种句法语义代数语法，本质上是一种中介语言（intermediate language）。（2）真值条件和蕴含关系在语义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Lewis（1972：169）提出，“没有真值条件的语义学就不是语义学”。从中即可看出形式语义学也称作“真值条件语义学”的缘由。真值条件和蕴含关系是基本的语义信息（semantic data）。这两条原则构成蒙塔古普遍语法框架的重要指导原则。（3）自然语言的语义是组合的。蒙塔古普遍语法框架的另一重要指导原则就是语义组合原则：复杂表达式的意义是成分的意义和成分组合方式的意义的函数（Partee，2011）。形式语义学家将语义组合原则改写为两条递归原则：句法规则n和语义规则n，并提出了句法语义对应规则，即“规则对规则假设”（rule-to-rule hypothesis）。句法规则不仅为表达式提供结构，更是语义解释的结构基础；语义规则负责对这些表达式进行语义解释。形式语义学继承了哲学家、逻辑学家的形式化方法，同时也继承了他们的语义观，如真值条件、模型论、组合原则等。采用数理逻辑手段研究自然语言的句法和语义，方法简洁，表述清晰，但在向语言

学家推介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例如形式化语言不属于人类的自然语言，形式化研究不关心语言学家关注的心理现实性、等等（Partee，2011）。

蒙塔古的三篇重要学术文章不仅为形式语义学搭建了基本框架和假设，也为形式语义学研究设定了议题、范围和方法。蒙塔古语法的特征之一就是采用语片法（method of fragments）。该方法旨在为语言的特定片段提供完整的句法和语义分析，而并不是为句子如关系从句或其他结构设定句法语义规则，更不是为某一语言建立完整的句法语义体系。基于这样的研究方法论，蒙塔古语法的常见议题包括：（1）与名词短语有关的语义研究，包括名词短语特别是量化名词短语、否定极项词、限定词、代词 / 照应语、语篇指示词、名词的复数特征、集体名词等；（2）与动词短语有关的语义研究，包括时态逻辑、模态逻辑、时间性（temporality）等；（3）与句子有关的语义研究，包括并列连词 and 和 or、关系从句、动词短语省略 / 照应、控制等；（4）与量化和辖域有关的研究，包括辖域、辖域歧义、约束与变量等；（5）副词、形容词的语义研究，如时间副词的量化、副词的辖域等。随着分段式话语表征理论的提出，形式语义学的研究范围也扩大到了复杂句、句群和语篇领域。

形式语义学是逻辑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也引发了计算机科学（包括信息科学和人工智能等科学）的高度关注。因此，形式语义学研究存在逻辑学偏向、语言学偏向和计算机科学偏向（代尊峰、孙洪波，2014；李可胜，2009；邹崇理，2001）。具体而言，逻辑学偏向的形式语义学研究以构建具有自然语言特色的逻辑推演系统为目标，典型代表就是中国逻辑学会会长邹崇理主持的《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逻辑与科学方法论”专栏，该学报每期刊载数篇形式语义学研究文章，议题涵盖形式语义学研究的诸多方面；计算机科学偏向的形式语义学研究旨在构造自然语言的部分语句系统，强调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语言学偏向的形式语义学研究注重对自然语言的逻辑分析，所关注的问题与理论语言学关注的问题一致（金立，2011；邹崇理，2001）。

本书以语言学偏向的形式语义学研究为核心。纵观十年来国内相关学术成果发现，形式语义学研究呈现如下特征：（1）聚焦形式语义学的

发展历史、基本理论与基本内容的引介、译介、阐释。这类介绍性、阐释性成果大多围绕形式语义学各个理论进行，无关宏旨。因此，本书除综述部分前沿成果外，不再单独重述十年来国内对各理论的引介与阐释。（2）从描写、分析、对比、实验等层面研究汉语语篇的句法和语义，研究话题相对集中，主要聚焦于量化词的句法语义特征，尤以潘海华及其合作者对“都”的系列研究为代表。这类研究大多属于静态形式语义学范畴。（3）聚焦话语表征理论、分段式话语表征理论在汉语中的应用，如汉语话语结构的修辞格式、汉语复句、汉语句群、对话关系的研究（高芸，2011，2013），汉语驴子句研究（陈琳琳，2013），条件句研究（邹崇理，2014），等等。这类研究属于动态形式语义学范畴。本书选取代表性文献包括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以汉语典型话题研究为主线，回顾十年来形式语义学取得的成绩。

5.2 形式语义学理论与方法探究

5.2.1 语境依赖性

20 世纪 80 年代，哲学领域倡导“语境主义”。在此背景下，形式语义学逐渐由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语境的地位得以凸显，语境成为形式语义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郭贵春，2009；夏年喜，2006）。语境在确定指称、解释名词的有定和无定特征等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十年来，语境研究的重点聚集在语境依赖性问题上，即真值语义的确定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语境。针对这一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回答：语境决定论和语义最简论。沈园（2011）梳理了二者的分歧源流，剖析了分歧的实质以及这场争论给形式语义学研究带来的挑战。沈园发现，语境决定论和语义最简论源于不同的哲学传统。前者源于日常语言学派，强调意义即使用，认为所有句子都对语境敏感，句子在语义层面上只表达“命题片断”，语境已经入侵到语义层面，只有引入语境才有可能表达完整的命题。后者源于理想语言学派，沿袭了形式语义学传统，认为句子在语义层面上表达完整命题，语义可以从语言使用中抽象出来。只有一小

部分表达如人称代词、指示代词、时间副词等对语境敏感。这些表达构成“语境敏感表达的基本集合”（Cappelan & Lepore，2005：1–2）。沈园认为，语境决定论对形式语义学所倡导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假设（组合原则和真值语义）构成了巨大挑战。面对挑战，形式语义学一方面坚持语义组合原则，避免将句法外的驱动因素导入语义内容的确定过程中，另一方面承认语境的作用，并清晰界定语境在赋予真值过程中的介入作用。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语境介入的层次、路径以及方式又是什么？

沈园（2015）又通过对比语境决定论和语义最简论对这些问题做了精细的回答。就语境影响真值的途径而言，语境决定论认为语境通过影响语义内容而影响真值，而语义最简论认为语境通过提供评价环境而影响真值。就语义组合和语境依赖性的关系而言，语义组合原则强调组成句子的语词意义的相对独立性，而语境原则强调语词意义的确定需要依赖语境。以形容词的语义解读为例，沈园证明这两条原则看似矛盾实则并不矛盾，词汇语义在语境中的变化恰恰是组合原则驱动的结果。此外，就语篇关系推理和语境关系而言，语篇关系的推导依赖语境。逻辑式中未决信息的填补、模糊表达的确定等都离不开语篇和语境。

5.2.2　语义实验法与语义诊断法

除主流的数理逻辑方法外，形式语义学也引入了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如实验法和语义诊断测试。沈园（2017，2020）详尽介绍了国外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应用。实验是理论语言学研究的常见方法之一，如实验语音学、实验句法学、实验语用学等。沈园（2017）从多个方面探讨了实验对语义学研究的特殊意义。例如，通过自定义步速阅读时间实验、反应时间实验等研究级差含义，为科学区分语义和语用提供事实依据；通过补语强制的语义加工实验探究补语强制句和简单及物动词句的区别，从而为确立隐性语义的性质提供证据；对单调性、真值条件相同的表达和量化词开展实验研究有助于我们找到具有心理现实性的语义属性或语义表征形式。

可喜的是，实验语义学也已经开始运用于外语学习和汉语信息处理研究中。例如，刘慧娟等（2011）通过游戏实验研究儿童习得汉语添加算子（如“还”“也”“又”）的过程；吴芙芸、李立园（2015）从在线加工（反应时）的角度考查了汉语使用者对辖域关系的理解；唐铁雯、陈晓湘（2018）对中国学习者英语主、被动句表层 / 逆序辖域开展了实验研究，采用自定义步速法完成 64 个基于图片的真值判断任务；吕骏、卢达威（2018）探讨了汉语母语者对英语量化词语义辖域的习得过程，实验采用图片 – 句子配对实验，并记录了受试从图片呈现到做出第一次判断的反应时。周思敏等（2018）通过心理语言学实验手段，探究汉语假设连词、复合句式和条件小句命题内容这些复句特征对违实义生成的影响。

除实验研究外，语言学各分支学科也大多采用诊断测试方法，形式语义学也不例外。沈园（2020）介绍了几十年来语义学领域常用的语义诊断测试方法及对例外和反例的处理方式。具体方法包括：语义最小对立对测试，用于研究特定表达形式在特定语境下的使用或意义；不可否认性测试（non-deniability test）或矛盾测试（contradiction test）、S 句群测试，主要针对蕴涵义、预设、规约含义、言语行为层面的言外之义、主观义等；挑战性测试（challengeability test），用于区分言外行为、在言内容和非在言内容；无错分歧法和动词 find 非限定补语法，主要针对主观义的识别。沈园提醒，语义测试要注意测试标准的清晰性和测试方法的针对性。同时，要正确认识例外和反例，这些例外会促进语言学家反思已有的测试方法，引发新的方法论思考和理论革新。此外，还要认真对待各类语义测试方法的跨语言适用性问题。

5.3 汉语典型话题研究

形式语义学经历了由静态向动态研究的转变，但我们发现国内现有探索仍偏向于静态研究，对汉语量化词的研究就是典型代表。尽管动态语义学也有所涉猎，但只局限于几类复句如条件句、违实句、驴子句等。本节对这些话题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做了详尽的介绍。

5.3.1　量化词研究

量化是形式语义学研究最透彻的话题之一。量化包括全称量化和存在量化，量化往往由量化词来表达。全称量化表达的是“集合 / 量化域内所有成员”的意思，典型的全称量化词包括汉语中的“所有”“全部”“凡”“每”“任何”等，英语中的 all、every、any 等。存在量化表达的是“集合 / 量化域内至少存在一个”的意思，典型的存在量化词包括汉语中的“有 / 某 + 单位词”如“有人”“某高校”，英语中的 some 等。从文献检索结果看，汉语量化词研究也是形式语义学研究最引人注目的话题，其中对全称量化词“都”和“每”的研究最为全面与透彻，而对其他类别的量化词特别是存在量化词涉猎较少。

1. 全称量化词：都

《现代汉语八百词》（吕叔湘，1999：177–178）区分了三类“都”，其中“都$_1$”表“总括”义，“都$_2$”表“甚至”义，“都$_3$”表“曾经”义。然而，多数学者期待用统一的语义来概括“都”的各类具体用法，提出“都”可以表“全称量化”（蒋严，1998，2009；潘海华，2006），表“加合”（袁毓林，2005，2012），表“分配”（Lin，1998），表“最大化”（Xiang，2008；Cheng & Giannakidou，2013）。与此相对应，“都”也被界定为全称量化词 / 全称量化算子、加合算子、分配算子、最大化算子。其中赞同“都”表示全称量化义者最多，且多以 Cheng（1995）和潘海华（2006）等人的研究为基础。

Cheng（1995）提出，表全称量化义的“都”具有三种语义特征：复数性、分配性和穷尽性。潘海华（2006）提出全称量化算子“都”总是约束限定部分的自由变量，量化由三部分构成：全称量化算子“都”、限定部分和核心部分。三分结构可以通过话题规则和焦点规则这两条映射规则来确定。话题规则是指如果“都”的左边存在可以充当量化域的短语，就把它映射到量化域，同时把句子的其余部分映射到核心域。焦点规则是指如果述题中含有一个焦点成分，就把它映射到核心域，同时把句子的其余部分映射到量化域。话题规则也称作左向量化规则，焦点

规则也称作右向量化规则。两条规则使用的优先顺序是左向量化规则优先于右向量化规则。潘海华提出的三分结构对汉语全称量化词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蕾等（2012）在前贤研究基础上详尽对比了“都”左向量化和右向量化时语义特征的异同：（1）复数性特征。无论“都”表达“总括”义、“甚至”义还是“曾经”义，且无论是左向量化还是右向量化，“都”的量化域都是一个语义上的复数性成分，核心域的基数都大于“一”。（2）焦点变量。焦点变量不同于焦点本身引出的变量。焦点变量是向外相容的，而焦点本身引出的变量是向内看的。不同于熊仲儒（2008），作者认为“都”约束的是焦点变量而不是焦点本身引出的变量。（3）穷尽性特征。当“都”左向量化时，量化成分的穷尽性可以不受限制或受语用因素的制约，而当右向量化时，量化成分的穷尽性绝对受限。

蒋静忠、潘海华（2013）在潘海华（2006）基础上，将表全称量化的“都”进一步区分为两大类：“都$_1$”和“都$_2$”，每一类下又划分出两个次类。分类的依据是“都”的量化域特征，包括两条具体标准：（1）量化域序列，即量化域中的成员是否有序，是否存在等级差别？（2）量化方向，即量化域是否是由“都”左边的成分提供？依据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作者区分了四类“都”（见下表）。此外，作者还依据潘海华（2006）提出的两条语义解释规则——“话题规则”和“焦点规则”进一步区分了这四种类别：“都$_{1a}$”和“都$_{2a}$”适用于左向量化的“话题规则”，无排他性；而“都$_{1b}$”和“都$_{2b}$”适用于右向量化的“焦点规则”，有排他性。表5-1表明，蒋静忠、潘海华的划分更精细，解释力更强，也更加符合人们对语言事实的语感判断。

表5-1 “都”的类别

		量化域有序	左向量化	排他性	示例
都$_1$	都$_{1a}$	−	+	−	大伙儿都同意。
	都$_{1b}$	−	−	+	他都去过哪儿？
都$_2$	都$_{2a}$	+	+	−	连这么重的病都给治好了。
	都$_{2b}$	+	−	+	都十二点了，还不睡！

然而，沈家煊（2015）认为区分左向量化和右向量化会使人陷入“量化迷途”。这是因为“话题规则”和“焦点规则”之间存在着不协调性，进而引发矛盾。具体来看，当左向量化时，适用话题规则的句子几乎都可以在“都”的右边找到一个焦点，而焦点适用“焦点规则”；相反，当右向量化时，适用焦点规则的句子几乎都可以在“都”的左边补出一个话题，只要存在话题，就该适用“话题规则”。由此看来，这两条规则都觉得对方是多余的。针对这一困惑，沈家煊抛弃了左向量化，提出了“右向管辖规则”，即按照句子的话题 – 焦点结构，将算子“都”在句法上管辖的焦点（一律在右边）映射到限定部分，同时把句子的其余部分映射到核心部分。沈家煊的创新之处就在于把“都”的语义管辖域与句法管辖域对应起来，建立了语义和句法的一一对应关系。

汉语中的“都”是全称量化词吗？学者们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全称量化说是简单比附英语全称量化词 all 的结果。徐烈炯（2014）从双重量化、全称量化、最大值、穷尽性、排他性、分配性等方面证明，这些语义都是“都”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都”的必要条件是“程度”和“主观性”。具体来说，只要说话人认为句子所表述的某个方面有某种程度达到或者超越期望值就可以给句子添加“都”。作者重新审视了各类“都”字句以及蒋静忠、潘海华（2013）给出的例句，发现这些示例无不证明某一方面达到了某种程度。这里所谓的“某种程度”是说话人主观认定的，而非客观的标准。因此，那些从客观上看表达量小的句法成分也能出现在“都”字句中，只不过是由于说话人主观认为数量达到或超过了心中自认的标准而已。基于上述原因，作者把“都”界定为副词，具体来说是一个情态附加语。

周永、吴义诚（2018，2020），吴义诚、周永（2019）则依据全称量化“全真为真，一假全假”的逻辑，对比“都”和汉英语中典型的全称量化词如“所有 / 每 /all/every”等，发现“都”不具体恒常的全量意义，允许出现例外，如“同学们都找到工作了，只有两三个没找到”。全称量化只是一种假象。作者从“都”的历时演变入手，发现“都”经历了最初的“汇聚”义到表“程度”的引申义，但是不论在哪种句法环境里，都涉及相关成分的作用范围。因此，作者把“都”界定为范围副词（周永、吴义诚，2020）。关涉的作用范围可以是显性的句子结构，

也可以是隐性的时间或语气。同时，作者依据“都”的语义语用功能，把“都”界定为表程度加强的副词，从语义功能上看“都”是一个强化词，在语用上起到增强句子语力的作用（吴义诚、周永，2019；周永、吴义诚，2018）。

除了对“全称量化说”提出质疑外，袁毓林（2012）也对“总括说”“分配算子说”“加合算子说”等提出质疑。当然，也有学者走折中路线，将“都”的不同语义或不同学说整合、关联。例如，尚新（2011）在“都”的“全称量化算子”和“加合算子”基础上提出了“双层级量化说”，目的是解决“都”字句中主语复数名词的语义问题。双层级量化包括初级量化和全称量化。初级量化指主语复数名词所指示的个体形成一个背景集合，事件类型把该集合中的各元素量化成不同类型和数量的集盖（cover）。在此基础上，“都”对集盖进行再量化，量化的结果就是集盖的标准化和均配化。尚新的双层级量化说充分解释了“都”字句中名词短语具有的复数义、集体义、分配义等特征。然而，冯予力、潘海华（2017）否定了集盖说的必要性，认为集盖说可能允准实际不存在的解读，且无法精确刻画句子的所有可能解读。

李文山（2013）把“都”的三分语义（即“总括”“甚至”“曾经”）简约为两类：“都$_1$”和“都$_2$”，并认为“都$_1$”是分配算子，但“都$_1$”并不是表示单纯的“分配义”而是包括了“分配”和“相对大量”两个语义要素，“都$_1$”所关联的对象总是位于“都”的左侧。“都$_2$”的语义内核仅包含“相对大量”，其关联对象可以位于“都”的左侧（即表“甚至”义的“都$_2$”），也可以位于“都”的右侧（即表“已经”义的“都$_3$”）。冯予力、潘海华（2018）梳理了“都”的各类意义，提出全称量化义是“都”的语义内核，具有穷尽性和排他性两大特征，而其他语义如分配性、超预期、程度高等都属于伴随义，源自全称量化结构的不同映射方式以及限定域的不同构成。具体而言，分配性是“都”在话题－述题映射时所呈现的一种伴随意义，是由全称量化的穷尽性语义特征赋予的；超预期是在话题－述题映射或背景－焦点映射时由限定域内梯级选项的有序性带来的语义效果；程度高与穷尽性属于事物的一体两面，是由于看待限定域的视角不同而造成的，因此也属于伴随义范畴。

针对“都”的“最大化操作”，冯予力（2018）首先区分了最大化

操作与加合操作、最大化效应及全称量化等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并批评现存对“都”的最大化操作分析混淆了这些概念，从而得出最大化操作不适宜用来精确描写“都”的语义，并确认“都”是全称量化算子而非最大化操作算子。

2.“每”

与“都”一样，学界对“每”的语义属性也存在有争议，有全称量化说（冯予力，2019；Huang，1996，2005；黄瓒辉、石定栩，2013）、加合算子说（Lin，1998；张蕾、潘海华，2019）、变量说（Yang，2002）、双重功能说（潘海华等，2009）、划分算子说（袁毓林，2012），等等。其中持有全称量化说的学者居多。

例如，黄瓒辉、石定栩（2013）探讨了全称量化词“每”的结构，区分了全称量化个体的“每”结构和全称量化事件的“每”结构。前一类的结构为“每 +（数词）量词 + 名词短语”，如“每个学生”，后一类的结构为“每 +（数词）次 / 回 + 事件表达成分”，如“每次回家”。从句法上看，“事件表达成分”排斥复杂结构，对时体成分、宾语形式、谓词语义类型有选择，偏爱条件成分；从语义上看，“事件表达成分”表示事件类别。作者比较了两类“每”结构，发现两类结构具有平行的内部结构，都指称类别，都将复数性成分映射为单数可数的成分。作者也比较了汉语的“每”结构与英语中对个体量化的“ every + 可数名词”结构和对事件量化的“ every time + 小句”结构，认为二者有相同的结构。然而，“每”与英语中的 every 是否相同？冯予力（2019）对比了英汉全称量化词 every 和“每”的语义差异，发现全称量化逻辑能较好地描写英语全称量化词 every 的语义特征，但无法准确描写汉语全称量化词“每”的意义。这是因为“每”具有多义性，可以表达全称量化，可以表达针对单一集合的加合操作或仅引入变量。作者由此得出，直接借用量化逻辑来研究自然语言特别是汉语量化成分的意义不具有可行性。

张蕾、潘海华（2019）对“每”的全称量化说提出质疑。他们沿着 Lin（1998）的思路证明“每”是加合算子。在“每 + 数量名”结构中，

“每”对其关联对象“数量名”进行加合操作，从而得到一个最大化的复数性集合，该集合包括一个加合算子“每”，一个加合单位“数量”和加合对象“名”。“每”的加合单位特征使得“每 NP”具有逐指性特征。当“每 NP”作主语时，其逐指性特征要求谓语要具有分配性特征；当“每 NP”作宾语时，谓语部分的语义特征无特别要求。作者由此提出，汉语很有可能缺少限定性全称量化词。不过，作者在质疑全称量化说的同时，又称“每 NP”具有“全称解读”（张蕾、潘海华，2019：513）。张蕾等（2009）也认为出现在主语位置上的“每”是全称量化算子。

3. 其他全称量化词

除“都”“每”外，汉语中还存在其他全称量化词，如现代汉语中的“所有”“全”“总”等，古汉语中的“群”“众”“凡”等、粤语中的“晒”等。

张蕾等（2009）对比了“所有 NP”“每 NP”以及“全 NP”，得出当这些表达式单独使用且出现在主语位置上时，“所有”和“全”是加合算子，而“每”是量化算子。从语义上看，“每”强调个体性；“所有”和“全”都强调整体性，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所有”只强调整体不看例外，而“全”强调整体中没有例外。

黄瓒辉（2013）、熊仲儒（2016）比较了全称量化词“都”和“总”。黄瓒辉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量化方向：“都”是左向量化，量化对象位于“都”的左边；“总”是全局量化，量化对象不是位于量化算子的左边或右边的某个位置，而是涉及量化算子所在句子的整体。很明显，黄瓒辉否定了“都”的右向量化。黄瓒辉和熊仲儒都认为，“总”只能量化事件，不能量化个体，而“都”只能量化个体。量化对象的不同也有助于解释“总”和“都”的不同句法表现以及二者的共现语序。

黄芳（2016）分析了先秦汉语中常见的全称量化词“群”“众”“凡”。这些全称量化词具有“类聚性、总括性”等语义特征。“群”出现在表人物的名词短语前，形成“群 + 人物 NP”，只能右向量化；“众”常常出现在名词后面，形成“NP + 众”，只能左向量化；“凡”居于名

词短语之前，属于右向量化。

李宝伦（2012）讨论了广东话中的修饰语全称量化词“晒”。“晒”属于全称量化词缀，附着于动词，给予关联成分全称义，且要求该关联成分必须满足复数条件，如“我解决晒啲问题啦（我解决了所有 / 全部问题了）。”作者提出了“晒”的量化可及性层级：直接宾语 > 动词后介词词组 / 间接宾语 > 动词前介词词组 > 主语 > 谓语，并证明无论句中是否有焦点，“晒”选择的量化对象都会由量化可及性层级来决定。Partee（1991，1995）区分了限定词量化和修饰语量化。前者极度句法化，是对焦点不敏感的量化；后者对焦点敏感，可推翻句法因素。李宝伦推翻了 Partee 非此即彼的认知，认为修饰语全称量化词“晒”对焦点不敏感，但是“晒”的成分关联由量化可及性层级决定，而这显然属于句法因素。

学者们除了探讨单个全称量化词的句法和语义外，还对多个全称量化词的共现展开研究。例如，李宝伦等（2009）探讨了“都”“各”“全”的共现，牛长伟、潘海华（2015），张蕾、潘海华（2019）探讨了“每”和“都”“各”共现的情形。这些词的共现是属于同类语义词汇的共现，还是属于不同类别词汇的共现？如果是前者，是否会造成语义上的冗余？如果都是量化词，为什么一个成分可以受到双重量化？如果是后者，这些共现的词汇又分别属于什么？例如，李宝伦等（2009）认为，“都”既是量化算子又是分配算子，“各”是分配算子，而“全”是个双功能算子，既可以用作范围限定词，又可以用作量化副词。张蕾、潘海华（2019）认为“每”是加合算子，而“都”是全称量化副词。

5.3.2　复句研究

量化词的研究更偏向于静态形式语义学，研究这些词在单句语片中的句法语义表现。相反，对复句的研究则超越了单个语句，是在话语 / 篇章层次对语义的探讨，属于动态语义学研究范畴。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各种动态语义学理论层出不穷，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话语表征理论（Kamp，1981）以及分段式话语表征理论（Asher，1993；Asher &

Lascarides，2003）。纵观国内十年来的研究，无论是汉语回指现象还是驴子句或违实句，多数研究是在话语表征理论框架内进行。处理这些超单句语片首先需要处理小句 S_1，得到其话语表征结构 DRS_1，再把小句 S_2 添加到 DRS_1 上，得到新的话语表征结构 DRS_2，如此下去，直到处理完最后一个小句 S_n，这样就得到该语句序列 S_1，S_2，…，S_n 的最终话语表征结构。话语表征理论有其固有的理论模块和操作步骤，主要包括句法规则、话语表征结构的建构规则和话语表征结构的语义解释，详细介绍可参看潘海华（1996）、邹崇理（1998）、高芸（2013）等。本节仅选取学界十年来关注较多的几类句式来介绍话语表征理论在汉语相关句式上的应用。

1. 驴子句研究

驴子句也是形式语义学研究的热点话题。这类句式最早由公元 5 世纪斯多葛派哲学家 Chrysippos 提出，20 世纪 80 年代进入语言学家的视野。

例 1
If a farmer owns a donkey, he beats it.

例 2
Every farmer who owns a donkey beats it.

以例 1 为例，这类句式的典型特征是 a farmer 和 a donkey 这两个不定名词短语具有全称量化义，代词 he 和 it 分别指 a farmer 和 a donkey。依据罗素的分析理论，这类不定名词短语属于存在量词，但是例 1 中的不定名词短语却获得全称量化意义，属于全称量化词。代词 he 和 it 与两个不定名词短语存在照应关系，是一个受约于该量化词的非自由变项，但从句法角度看，代词 he 和 it 在小句不受约束，不可能用作非自由变项（温宾利，1997）。传统逻辑语义学无法解释不定名词短语如何具有全称量化义以及不定名词短语如何与代词形成照应关系。英语典型的驴子句有两类：条件句驴子句（如例 1）和量化关系句（如

例 2）（英语驴子句的详尽特征介绍可参看文卫平（2006）博士学位论文《英汉驴子句研究》）。为了解释这种矛盾现象，Evans（1980）提出了“E 型代词理论”，Kamp（1981）和 Heim（1990）基于“话语表征理论”提出了无选择性约束理论，Chierchia（1992，1995，2000）提出了动态约束理论（各理论的详细介绍参见王梦、武文斌，2012；温宾利，1997；文卫平，2006；文卫平、方立，2008）。Cheng & Huang（1996）将驴子句概念引入汉语，区分了光杆条件句和“如果 / 都条件句”。自此，驴子句成为汉语句法和语义研究的热点。学者们从生成语法（温宾利，1997，1998）、类指理论（文卫平，2006；文卫平、方立，2008）等视角描写、分类、解释英汉语中的驴子句。

陈琳琳（2013）则在话语表征理论框架下讨论了汉语三类驴子句：条件句驴子句、关系句驴子句以及类指隐性驴子句，并解释了各类驴子句的省略情形。作者首先修正了话语表征理论，包括：（1）改造了话语表征理论的句法规则，把汉语特殊句法形式融入规则体系。例如，汉语中没有关系代词，但有“的”字结构，作者就把这一结构写进句法规则，同时细化了词项插入规则。（2）改造了话语表征结构，融入了汉语驴子句中的不定名词短语“一 +（量词）名词”结构和表“非疑问”的疑问词“wh...wh”结构。其中，不定名词短语可以表存在，也可以表类指，而“wh...wh”结构中的疑问词并不是表存在，而是表泛指。这两类结构的语义不同，处理方法也不尽相同。同时也添加了“的”字结构相关的句法构造规则，代词 PRO 的构造规则，否定句、条件句、全称量词规则等。最后作者以模型 M 为参照解释话语表征结构，把条件句驴子句放在条件句的模型解释中加以说明，把关系句驴子句和类指隐性驴子句放入全称量词模型解释中加以说明。陈琳琳（2013）把学界曾讨论过的各类驴子句包括有争议的驴子句都纳入关注范围，可以说是一项截至目前讨论最全面、最深刻的形式语义学研究。

2. 条件句

条件句是汉语常见句式之一，受到逻辑学和语言学的广泛关注。逻辑学偏向的研究对条件句的逻辑本质、句法语序特征等做了有意义的探讨（陈晶晶、石运宝，2019；娄永强，2012；邹崇理，1996，2000）。

语言学偏向的研究对这类复句的特征形成了一些共同的认知，如条件句是因果复句，包括假设的条件、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和无条件的条件，但尚未对这类句式的深层逻辑语义结构做更为翔实的解释［相关评述见佟福奇（2012）］。

佟福奇（2012）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条件关系范畴的语言表达》中以逻辑理论、话语意义建构理论、关联理论、话语表征理论、情境语义学等理论为背景，以条件关系范畴为研究对象，梳理了条件关系范畴的四类逻辑推理结构：假言推理范畴、选言推理范畴、负命题推理范畴、与模态有关的推理范畴，并依据蒋严、潘海华（1998）的部分语句系统 C_P 构建了条件关系范畴的语句系统 CC_P。该系统包括四个句法规则、四个翻译规则以及基于真值条件的语义解释。作者探讨了条件范畴语言表达格式的整体意义，认为这些意义并不依据笼统的、简单的条件关系如蕴含、逆蕴含或充要条件等就能够做出充分的解释，而是必须从整体着眼，这些意义是从底层逻辑语义基础上升到表达层面经过语用化而获得的。例如，表达充分条件假言范畴的“因为……所以……”格式的整体意义是述说因果、否定某种情况或事实的可能性、强调某种联系等。基于各类语言表达格式的整体意义，佟福奇（2012：115）绘制了一幅条件范畴语义地图，图中清晰地勾勒了不同义项间的亲疏关系。最后，作者分析了条件句的交际意图并构建了关系范畴的语义生成模型。显然，佟福奇的研究打破了原来对条件句的纯逻辑分析或纯语法结构描写，而是把逻辑、语法、语义、语用、认知等要素融合起来综合考查，为我们构建了一幅翔实的条件句全景图。

不同于佟福奇采用经典逻辑理论处理条件句中前件和后件之间的关联，邹崇理（2014）转而运用话语表征理论来解释前件和后件的关系。因为依据经典逻辑（真值逻辑），自然语言的条件句会制造“蕴涵怪论”，条件句的前后件可能说的是不相干或不搭界的事。然而，条件句不仅依靠前后件的真假组合，更重要的是依赖条件关联。在这种关联下，前件可以转化成具有真值的语句，后件的转化随之而来。这就体现了动态语义学的分析方法，即首先生成前件话语表征结构，把该结构基础上递增到后件上，话语表征理论模型中的嵌入确认函项随之进行动态扩张（邹崇理，2014）。邹崇理以“若马是哺乳动物，则它是脊椎动物”“If

Jones owns a book then he uses it”等为例，描述了条件句的句法规则、话语表征结构。在参照嵌入确认函项进行语义解释时，作者提出需要给话语表征理论模型中添加认知因素。例如，给嵌入确认函项的扩展设定认知依据，具有认知依据的可以扩展，没有认知依据的则不能扩展。例如，“如果 1 是整数，那么雪是白的”这样的语句就缺乏认知依据。该文以自然语言条件句为研究对象，以动态语义学为理论依据，但涉及的条件句类别较少，未能全面概括解释条件句的多种条件关联模式。

3. 违实句

自 Bloom（1981）提出汉语缺乏表达违实语义的语法范畴以来，违实句、违实范畴就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热点。经心理现实性、语言本体、语言类型学等多视角的研究证实汉语中存在违实范畴，只不过这种范畴是语义的，而非语法的（蒋严，2000；雍茜，2014，2015；袁毓林，2015；周思敏、张绍杰，2019）。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的违实标记可以分为特定违实标记和非特定违实标记。前者包括假设连词、动词、副词、小品词、附着词、词缀，后者包括词汇动词、时态、体貌、情态、语气等（王宇婴，2013；雍茜，2017，2019；袁毓林，2015）。

雍茜（2014：62–63）通过语用途径确立了三类违实条件句（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中命题的真假值：（1）已知 p → q，p 为假，求证 q 为假。例如，“如果一加一等于三的话，我就跟去见她。”这类条件句的语用目的是用一个既定的假事实 p 去否定另一个真假难测的事实 q，判断既定事实的真假依赖于语境因素。（2）已知 p → q，q 为假，求证 p 为假。例如，“如果你能考得上博士，太阳就会从西边出来。”这类条件句的语用目的是通过一个确定的假命题 q 去否定真假未明的命题 p。（3）已知 p → q，p 为假，求证¬ p →¬ q。例如，“如果我刚才不在这儿，我就不会听见你骂我的话。”这类条件句的语用目的并不是确立命题 p 和 q 的真假，而是寻找¬ p 与¬ q 之间的因果关联。在三类违实条件句中，命题 p 和 q 真值的判断都依赖语境或语句。

林若望（2016）基于模态语义学在 Chen（2015）基础上探讨了道

义模态命题“应该 Ø 的”（如“你应该通知她的”）句式的三种违实义：与过去事实相反、与现在事实相反、与未来可能性相反。“应该 Ø 的”也可以表达未来非违实义。不同时间的解释和事态类型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有界动词短语会得到与过去事实相反的语义，无界动词短语则会得到与现在事实相反的语义。作者把“应该 Ø 的”句式的违实及非违实两种语义归结为“的”的语法意义：“的”引介出一个非未来时段，确认它所修饰的命题在它所引介出的非未来时段里为真，也预设动词短语的所指是语境中的旧信息。违实义的产生源于模态命题的事件真实性强度弱于直接断言一个过去或现在的事件。依据 Grice 的语用原则，推论出事件不为真。违实义不可以取消是因为“的”具有广义的确认功能，用来确认其辖域底下的断言和蕴含为真。

朱庆祥（2019）对林若望（2016）的分析提出质疑。通过语料库检索，朱庆祥发现“应该 Ø 的”结构不仅可表达违实义，还可以表达过去和现在属实义，且“应该 Ø”不仅可以表达属实义还可以指向过去事件，表达违实义。由此看来，有没有“的”都可以表达违实义，林若望认为“的”引介出一个非未来时段的观点就值得商榷。朱庆祥依据 Palmer（2001）对道义情态的分析，提出道义情态“应该 Ø 的”的使用受到［恒常性］［须履行性］两个语义语用特征的影响。当“应该 Ø 的”属于恒常性道义事件时，并不存在违实性与否的问题。因为此时谈论的不是具体的一次性事件，也不针对具体对象，而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具有相对恒常性的道义，这类道义对该范围内的成员具有普遍适用性。相反，当“应该 Ø 的”谈论的是具体事件、针对具体对象时，就有“违实”“非违实”“属实”的区别。作者细分了四种情形：应该履行而没有履行或履行错了，事件并没有发生或与事实不符，就是违实；应该履行的，且存在履行的机会，可以马上或将来实施的，属于未来非违实；符合道义的，该履行的且已经履行，事件确实发生了，可以得到道义上的肯定，就是属实而非违实；做了不应该做的、违背道义的，事件已经发生了，要受到道义层面的谴责，就是属实而非违实。

对于违实条件句中前件和后件命题 p 和 q 真值的判断不仅需要依赖语句本身，还需要依据语境。语境成为违实条件句语义确定的关键。王宇婴（2013）构建了三层语境系统解释违实句：（1）局部语境，句中

的违实成分贡献语句的事实意义和否定意义；（2）复合句子语境，负责前件和后件的语义解读，其中前件违实成分的语义对整句的语义解读起决定作用；（3）宏观语境 / 话语语境，包括上下文、百科知识、交际情境等。这三个层面相互作用，产生两种推理模式：（1）从违实成分到复合句子自下而上的推理，前件违实成分提供了充足的违实信息，触发后件产生违实解读，此时无需依赖宏观 / 话语语境；（2）从宏观语境 / 话语语境到复合句子自上而下的推理，当宏观语境 / 话语语境与前件的违实信息产生矛盾，或前件缺少帮助表达违实的信息时，就要诉诸宏观语境 / 话语语境。王春辉（2016）也构建了汉语条件句违实义达成的复合系统，主要包括五种因素：百科知识、语境、标示过去时间的词语、否定、结果小句中的句尾“了”。其中，语境和否定出现频率最高，而百科知识和语境是达成违实义的最可及因素。

5.4　形式语义学研究展望

对语言开展形式化研究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各种学派与理论层出不穷。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形式句法学和以蒙塔古为代表的形式语义学。作为一门逻辑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形式语义学经过五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信息科学、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的一种主要的研究方法。然而，正如沈园十年前指出的那样，形式语义学在国内语言学界远未成为主流（沈园，2011）。或许我们可以从 Partee 十年前的分析看出其中的深刻缘由。Partee（2011）指出，逻辑学家创造了形式语言，并采用形式化手段研究这种语言的句法和语义。然而，形式语言的结构不同于自然语言的结构，语言学家自然就把形式语言排除在人类可能语言的范围之外。以模型理论语义学为例，逻辑学家们习惯了设计形式语言，其中充满了未诠释的非逻辑术语。尽管这些理论框架为解释形式语言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但是秉承语言学传统的语义研究者们视自然语言为独立存在的经验现象，模型理论语义学所提供的另类解释极不自然。此外，逻辑学家回避了语言的心理现实性，但是对于语言学家来说，心理现实性

又至关重要。

然而，十年过去了，我们看到这种学科壁垒、学科界限依然存在。形式语义学作为一个以自然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包含了蒙塔古语法、广义量词理论、动态语义学、情境语义学、博弈论语义学、类型逻辑语法、范畴组合语法、动态句法学等。纵观国内形式语义学研究文献发现，偏向逻辑学的形式语义学研究涉猎话题广泛，前述议题多有触及，例如高芸（2011，2013）运用分段式话语表征理论研究汉语复句、句群，把修辞结构引入到话语的逻辑形式之中，力图解决更多的语义问题，促使汉语语义研究与国际接轨。相反，从语言学类期刊所刊载文献上看，我们发现语言学偏向的形式语义学研究还有更广阔的疆土等待着我们去开辟、去探索。

（1）关注典型议题的同时向更广的话题延展。现有研究关注量化与辖域、驴子句、违实句，也有研究关注极项词（如陈莉、潘海华，2020a，2020b；文卫平，2013）、时态逻辑（如王媛，2011a，2011b；于秀金，2013；于秀金、张辉，2017）、汉语虚词（如王欣，2012）、疑问词（如刘明明，2018）、副词（如蒋勇、廖巧云，2012；石定栩、孙嘉铭，2016；姚瑶、石定栩，2015）、焦点与辖域（李宝伦，2016；刘丽萍，2014）等。但是相比于全称量化的丰硕成果，这些议题论及较少。

（2）关注静态语义学研究的同时要走向动态语义学研究。现有议题集中于量化，例如全称量化词的研究或与量化相关的极性敏感词研究（以潘海华与合作者开展的大量研究最具有代表性）。量化研究是蒙塔古语法的核心议题之一，但是蒙塔古语法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例如，无法恰当处理不定名词短语，无法刻画语篇中代词的照应关系等。以话语表征理论、分段式话语表征理论为代表的动态语义学应势而生。这些理论不仅能清晰刻画话语的语义结构，还能在修辞结构基础上处理话语的连贯性，以形式化的方法呈现并刻画自然语言语篇的语义，因而具有强大的描写力和解释力。这些新的理论在语言学领域早有译介，例如潘海华（1996），但是尚未成为主要研究议题，鲜有研究将之运用于汉语语义研究或以汉语事实去修正、挑战这些理论模式。

（3）关注形式语义学学理探究的同时开展实验语义学研究。沈园（2017）探讨了实验对形式语义学研究的意义，我们也看到国内已有学

者如刘慧娟等（2011），吴芙芸、李立园（2015），周思敏等（2018）采用实证主义方法研究诸如量化词、辖域、违实义等。但是，相比文献梳理、理论探究、学理思辨等研究，围绕形式语义学的基本假设与理论等开展的实证研究在国内尚未盛行开来。开展实证研究无论是对深入理解形式语义学本身还是构建形式语义的心理现实性抑或理解语言习得规律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关注形式语义学的同时积极开展形式语用学研究。Montague 在 1974 年的论文集中以《语用和内涵逻辑》为题讨论了指示语的形式化研究，开辟了语用学研究的形式化路径。之后学者们提出的文档更新语义学、情境语义学、话语表征理论等都将语境因素纳入语义研究，目的在于对语境、指示信息、显性意义、隐含意义、前提、命题态度等语用现象、语用机制进行形式化操作（冉永平，2005）。21 世纪第一个十年见证了国内形式语用学从引进到与汉语事实相结合的过程，如吕公礼（2003）的《形式语用学浅论》、蒋严（2005）的《形式语用学与显义学说》、刘根辉（2005）的《形式语用学研究综论》、张韧弦（2008）的专著《形式语用学导论》、曾凡桂和毛眺源（2010）的《形式语用学发展脉络概略》、黄振荣（2010）的《条件句的强化与显义学说》、于林龙（2010）的《形式语用学的意义理解问题》、蒋严（2011）的专著《走近形式语用学》等。然而，过去的十年，国际形式语用学研究热情高涨，反观国内的研究对此话题涉猎甚少。

5.5　结语

形式化作为自然语言探究的一种主要手段，已经成为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人工智能、计算机语言处理等研究领域的核心方法与理念。然而，从整体上看，我们可以说形式化研究在我国的发展整体落后于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研究范式或研究路径的发展。我们期待国内语言学习者、研究者对形式化研究少些抵触，多些认识。唯有如此，才能迎来形式化研究的稳步发展。



新时代外国语言文学
新发展研究丛书

清华社官方微信号

扫我有惊喜

ISBN 978-7-302-57274-9



定价：108.00 元